

樣注意到「印刷」這種話語外部的生產機制。作者通過楊廷筠《代疑篇》等有關資料，探討了印刷術在全球化進程中扮演的角色。不知蘇源熙是否受到「文化研究」的影響，但他在理論上達到一種平衡：既沒有將話語「物質化」，也沒有忽視話語的物質層面。如果作者能夠增加一點統計學資料來佐證他的判斷，那將會顯得更為有力。

蘇源熙將「話語長城」放在「文化中國」的背景下，而不是恆溫的

「博物館」裏。這促使作者研究了「話語的旅程」，同時他的研究又成為新的「話語的旅程」。《話語長城》的第六章有個副標題：「一幅草圖和一些問題」，我更願意把它看作整本書的副標題。鑒於這是一本論文合集，該書在章節銜接上未免有些「上氣不接下氣」。但作者清醒的問題意識，使得該書充滿思想的驅動力。最後指出一點無傷大雅的小錯誤，張君勱被翻譯成Zhang Junli（頁233），實為不妥。

文革中的異端思潮說明了甚麼？

- 徐友漁



Heterodox Thought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, Parts I and II, *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* 32, no. 4 (Summer 2001); 33, no. 1 (Fall 2001).

宋永毅、周澤浩兩位學者作為特邀編輯和翻譯，為美國英文版《當代中國思想》學報翻譯並編輯了兩期題為「文化大革命中的異端思潮」的專號（2001年夏季號和秋季號），並為每期專號撰寫了長篇導論，這是一件有特殊意義的工作。這說明，文革研究雖然在中國大陸一直是禁

區，但在海外，由於中外學者的艱苦努力，卻不斷地在世界範圍內取得紮紮實實的進展。

兩期專號編輯了從遇羅克的〈出身論〉到王申酉的〈1949年後的中國和我對毛主席的看法〉等19篇文獻，其中有的已廣為人知，有的則連專門的文革研究者也是首次閱讀。這為世界性的讀者和專門研究者（不僅對中國人，也對懂英語的所有外國人）全面了解中國人在文革期間的思想狀況，了解文革為甚麼會破產，了解思想的無法扼殺的力量，了解中國人願意、敢於為自由與民主付出多大代價，提供了豐富的、難得的材料。如果考慮到文革中的大字報等文獻的難譯程度和收集編輯、理清脈絡的艱難，兩位學者對世界了解文革真相作出了特有的貢獻。

文革中的異端思想有不同的門類與派別，有的從右的方面，有的從左的方面反叛、批判當時的文革宣傳和現實，但通讀兩期專集中的文獻以及編輯的註釋，我們可以歸納出以下特徵。第一，絕大多數思想者都曾堅信官方的文化大革命理論，並極其熱情地投身於文革；第二，幾乎所有的思想者都篤信馬克思主義，他們的努力，都是要使文革混亂的理論和現實回到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的軌道上去；第三，所有的獨立思想者無一例外地遭到了鎮壓和迫害，其中有人被處決。

由此，我們對於文化大革命的性質，可以得出以下結論。

第一，文革的指導思想是虛偽的欺騙，文革並不是「偉大的群眾運動」，而是利用群眾、欺騙群眾。為了打倒政敵，毛澤東和「中央文革小

組」一夥精心炮製了一個神話：他們的路線是支持群眾、保護群眾，而對方則是打擊群眾、鎮壓群眾。實踐很快就使這種謊言破產，文革派一度把首批紅衛兵捧上了天，稱他們為「革命小將」、「天兵天將」，其實不過是利用他們製造天下大亂的形勢，一旦達到目的，不再需要他們，就將其拋到一邊；他們一旦妨礙實現文革的真正目的，就被打成「反革命」。運動初期，文革派堅決支持造反者的「自己解放自己」、「踢開黨委鬧革命」的口號，而當造反者繼續堅持這些口號，把這些口號運用於中央文革小組自身時，他們馬上被定為「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」。文革的積極參與者，甚至一些狂熱盲信者，他們的懷疑與醒悟，首先在於看出了文革發動者的政客手腕、口是心非。

第二，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理論，並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。雖然林彪把毛澤東思想吹捧成「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克思主義」，而文革的心理基礎和意識形態基礎正是這種無原則、無止境的個人崇拜，但許多一度對毛澤東無限熱愛、無限崇拜的青年學生，終於覺悟到那種「馬克思主義的頂峰」是偽馬克思主義。異端思想的第一步，往往是從毛澤東思想回歸真正的馬克思主義，並進而用人道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批判那種粗陋的、野蠻的中國式馬克思主義。文革中最具有諷刺和悲劇意味的事情是，一方面，中國被宣稱為世界上幾乎唯一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國家，另一方面，遍及全國、自發形成的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、研究小組被當成反

文革中最具有諷刺和悲劇意味的事情是，一方面，中國被宣稱為世界上幾乎唯一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國家，另一方面，遍及全國、自發形成的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、研究小組被當成反革命組織，成千上萬探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青年遭到鎮壓。

最早對文革產生懷疑的人，往往是一度捲入最深、堅信不疑的人。看看現今那些為文革叫好的人，神往於毛的無特權、無等級的平等社會。不知他們有沒有想過，為甚麼為了實現崇高的社會理想，就需要逮捕、處決那些充滿理想、對他們的權位毫無威脅的年輕人？

革命組織，成千上萬探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青年遭到鎮壓。

第三，文革和建設新文化無關，和剷除特權、建立平等社會無關，和造就一代新人無關，文革的本質是大迫害、大鎮壓，文革發動者既用狡詐手段使政敵陷於被動，殘忍地剷除他們，又無情地鎮壓曾經忠實於自己、追隨自己的青年。他們用馬克思主義和各種動聽的言辭把群眾發動起來，而一旦人們把那些話當真，以為真是可以獨立思考、追求真理，他們立即把人送進監獄、送上刑場。

文化大革命的虛偽性和殘忍性，只有親身經歷過的人才可能有準確評判。如果僅僅靠事後閱讀1966-76年的《人民日報》、《紅旗》雜誌，研究者很可能會認為，那真是一場「史無前例的大革命」，真是「人民的盛大節日」。只有經歷過文革的人，才知道除了少數打手，不論在所謂「紅色恐怖」的1966年8月，還是1968年「一打三反」的日子，人們是如何恐懼，始終有大禍臨頭之感，哪怕幾天之前你還是批判「走資派」的「革命派」，甚至在專別人的政。正確判斷源於深入了解，當文革中一度最為得勢的林彪集團的「『571』工程紀要」公布時，人們真是大開眼界，這份文件對於文革的虛偽性和殘忍性的揭露，可能超過了任何一種異端思潮。比如「紀要」說：「他們所謂打擊一小撮，不過是每次集中火力打擊一批，各個擊破。今天利用這個打擊那個，明天利用那個打擊這個，今天一小撮，明天一小撮，加起來，就是一大批。不僅挑動幹部鬥幹部，群眾鬥群眾，而且

挑動軍隊鬥軍隊，黨員鬥黨員，是中國武鬥最大倡導者。」

研究文革中的異端思潮可以發現，那些最早對文革產生懷疑的人，往往是一度捲入最深、堅信不疑的人，因為正是他們，對於理想和現實的差距最為敏感和不滿，對於欺騙如何奏效，利用如何發生，有着切身體會。看看現今那些為文革叫好的人，可以發現不少是不諳世事，只有理想或書本知識的人。這些人津津樂道於毛澤東的「五七指示」體現的全面發展的理想，神往於毛的無特權、無等級的平等社會。不錯，文革中充斥了這一類美好言辭，有的是官方宣傳，有的是青年學生一廂情願的理解和發揮。不知他們有沒有想過，為甚麼為了實現崇高的社會理想，就需要逮捕、處決那些充滿理想、探討真理，對他們的權力、地位毫無威脅的年輕人？難道他們的平等理想就是無數生命的祭壇？

在這兩集專號中，對於眾多思想者和探索者，最引起我感歎和深思的是王申酉，他是在1977年4月27日被處決的。這位對文革有批評意見、對毛的極左路線有疑問，極其刻苦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年輕人，在文革元兇「四人幫」垮台已經半年之後，為甚麼還會慘遭槍殺？他既未成立反對派組織，又未進行反官方宣傳（姑且不談即使如此也不犯法），僅僅因為在日記和私人信件中表達了個人的見解，就以「反對毛主席」的罪名被判處死刑。仔細閱讀有關王申酉的材料可以發現，他的厄運並非始於文革之中，而是文革之前：班長偷看了他的日記，政治輔

導員決定把他當作反面典型。不錯，在文革那瘋狂歲月，他的「罪行」不斷升級，但「四人幫」的垮台，不是被說成是人民的「第二次解放」嗎？難道他不應該被平反嗎？事實上，王申酉不是被「四人幫」殺害的，而是被所謂的新政權處決的。

王申酉的遭遇說明，對於人權，對於法治，對於思想自由而言，文化大革命，文革之前和文革之後，並沒有截然的界限，並沒有本質的區別。

人們習慣於把文革說成是一場噩夢，習慣於把文革稱為荒唐歲月，這不經意地包含着這種意思：文革固然可怕，但它已成過去，它是一去不復返了。我希望如此，但讀了有關王申酉的文字，我發現尚沒有充分理由相信這一點。對於文革的研究還是禁區，使人更沒有理由相信這一點。我知道，要真正告別文革，還需要我們努力，這種努力包括與讚美文革的傾向和呼喚文革的企圖鬥爭。

人們習慣於把文革說成是一場噩夢或荒唐歲月，其意思是：文革固然可怕，但它已成過去，一去不復返了。我認為要真正告別文革，還需要我們努力，這種努力包括與讚美文革的傾向和呼喚文革的企圖鬥爭。

林中空地：翻譯中生成的現代性

● 談火生



劉禾著，宋偉傑等譯：《跨語際實踐——文學、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（中國，1900-1937）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02）。

「現代性」概念自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可謂是中國學術界的寵兒，對「現代性」問題的研究和西方「現代性」理論的譯介成為近十年來學界常盛不衰的主題，不同學科、不同學派的學者都或多或少、或深或淺地捲入這場討論。當他們各自借助不